

禪宗五祖弘忍大師的革新智慧探究

桂 勝

隋唐時代，佛教得到長足的發展。五祖弘忍（601—674），今湖北黃梅人氏，銳意革新，一變祖師禪風，傳《金剛般若》以代《楞伽》，化漸修為頓悟，變壁觀、理入為農禪合一；傳燈佈道，不拘一格，改一脈單傳為“法門大啓，不擇根基”；承襲法嗣，重器識徹悟而輕資格、輩份，承四祖道信禪師之志，在湖北黃梅東山另設道場，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新體系，成為開啓“東山法門”的一代宗師。弘忍大師從思想理論、政治經濟、組織行為等方面對佛教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其改革中貫穿著的隨勢、隨緣精神與其禪學思想一道，皆可視之為啓迪世人之智慧，成為人們借鑒的改革案例。縱觀中外改革成功的經驗，不外乎有下列要素；改革要讓方方面面受益、改革的內容要具有可操作性、改革要順應形勢、改革要選擇好接班人等等。而這些要素在弘忍大師的改革過程中都得到了體現。

一、隨勢——因勢利導推行變革

弘忍主持五祖法壇年間，唐代的社會政治經濟、思想文化較之開國時期有較大的變化。這些變化對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。從客觀上講，科舉取士之考試制度為一些庶族、寒門的進身鋪開了道路，給封建的官僚體制或多或少增添了生機，打破了功勳貴戚壟斷政治、思想文化的局面；儒、釋、道由勢同水火逐漸走向合流。從主觀上講，佛教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暴露的種種弊端——寺院膨脹的特權、門派的龐雜、教義的繁瑣以及一些參加開國政治、軍事角逐“有功”而被唐初統治者賜以高官厚祿的僧侶因驕奢淫逸、爭田奪地、腐化墮落而聲名狼藉，如此等等，極大地障礙了佛教的發展和傳播。社會形勢（統治者需要宗教為其專政服務）、文化發展趨勢（三教合流及佛教自身的命運）、人們心理情勢（各層次人對宗教的心理需求）等向佛門提出了新的要求。面對歷史的選擇，弘忍大師勇敢地肩負起革新佛教的歷史使命，因勢利導地對佛教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。

一是肯定眾生皆有金剛佛性。中國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視對性的闡釋和界定：“食色，性也”，“性善”，“性惡”乃先秦諸子給“性”下的定義；性分之為三：“善”、“惡”、“無記”（非善非惡）乃過去釋家的性觀。弘忍將傳統的觀點加以有機地改造而提出“一切眾生，皆有金剛佛性”。《最上乘論》說：“眾生身中皆有金剛佛性，猶如日輪，體明圓滿，廣大無邊。”這種金剛、真如佛性，聖賢哲者具有，凡夫俗子同樣具有，即“一切眾生，皆如也，眾聖賢亦如也。一切眾生，即我等是也。眾聖賢者，即諸佛是也。名相雖別，身上真如法性並同，不生不滅”（同上）。所不同的是眾生覺了——“自性悟”便是（ \cong ）佛，“自性迷”便依就是眾生。弘忍這種帶民主色彩的佛性理論動搖了貴族僧侶壟斷宗教的地位，為廣大下層人民所樂意接受，道出了一些新生勢力的心聲，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支持。“時四方請益，九眾師橫，虛往實歸，月逾千計”，“東山多有得果人”，其斐然有成者見於正史記載就有 28 人（其中一人是高麗僧）。

二是提出了“即心是佛”的命題。如果說弘忍大師所提出的“一切眾生，皆有金剛佛性”之革新理論是因其有教無類，影響和輻射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，那麼“即心是佛”則是因其簡便易修而被世人津津樂道。這也表現了“隨勢”的特徵。

隋唐以前，佛教門派龐雜，各宗教經卷繁瑣。禮佛者，各承師門，皓首窮經，修成正果者寥寥無幾，使人感到由此岸到彼岸可望而不可及。有感於此，弘忍大師繼承並發展前人

的頓悟思想，改學《楞伽經》為《金剛經》並把它作為本門嫡傳的心法傳給慧能。

“即心是佛”、“但守一心”是頓悟成佛及《金剛經》的精髓。“守心者，乃涅槃之根本，入道之要門，十二部經之宗，三世諸佛之祖”。弘忍說：“心本來清淨，不生不滅，無有分別。自性圓滿、清淨之心，此是本師。”在弘忍看來，這種絕對的精神本體——“本心”或曰“真如佛性”，眾生“自然而有，不從外來，不屬於修”，關鍵在於自識，自守，勿迷，勿妄，“若識心者，守之則到彼岸；迷心者，棄之則墮三塗。”弘忍認為：“眾生有金剛佛性……只為五陰黑雲所覆，如瓶內燈光，不能照輝。譬如世間雲霧，八方具起，天下陰暗。日豈爛也，何故無光？光元不壞，只為雲霧所覆，一切眾生，清淨之心，亦復如是。只為攀緣妄念，煩惱諸見黑雲所覆，但能凝然守心，妄念不生，涅槃法自然顯現。”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千經萬論，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”（引文具見《最上乘論》）。

“即心是佛，見性成佛，以無為宗”，這種重心性，輕經書，靠守心頓悟而不必坐禪的修行方式大大地縮短了由此岸到彼岸、地獄到天堂的路程，由咫尺天涯而天涯咫尺，使幻想進入天堂、彼岸者從卷帙浩繁的經典和曠劫不絕的苦修中解脫出來，客觀上既迎合和滿足了世俗的需要，亦因擴大了麻醉人民鬥志的影響面而受到統治者的賞識。即使是唐武宗毀佛，五祖寺也未受到任何衝擊。

農禪合一為弘忍“即心是佛，見性成佛”理論的應用。既然眾生皆有佛性，成佛在於守心，那麼修行方式便可靈活。只要心有靈犀，鳥語花香、日照月映、青苔細流等時空物景皆可觸發禪機。這就為打坐參禪，勞作同樣也能證得菩提提供了理論依據，正如慧能所說的“運水劈柴，無非妙道”。弘忍提倡衣食自給，他自己栽竹植樹，打柴擔水。門下弟子粗食破衣，辛勤耕作。後來成為禪宗一代祖師的慧能更能甘為雜役，墜石踏碓。禪門汝後能昌大一時，從某種意義上講亦得益於自食其力的中國化的小農經濟生活方式。自食其力對寺院特權經濟的弊端是一個有效的糾正。

二、隨緣——不拘一格選法嗣

良好的方略還要靠優秀的人才來實施，慧能的素質、弘忍大師的擇人任勢，隨機應變，隨緣而化使革新的成功得到了可靠保證。隨緣亦即隨機，從漸悟到頓悟的轉變需要時機。機，是事物發展中不易覺察的徵兆和事物變化的轉捩點、關節點。它具有強烈的時間性，弘忍天資聰慧，觸事即悟，早在雙峰山師承道信時，就有意頓教。弘忍即位後，深感革新佛法，推行頓教意義之重大。他矢志不移，一方面聚徒佈道，勸僧徒持誦頓門學說《金剛經》，作理論準備，一方面堅持“法器成熟，方授深法。”當社會勢機、物機皆有利於頓教時，弘忍借傳授衣鉢，命弟子各呈偈語，明心見性，以示悟證，期望其畢生所願、未竟事業有合心的繼承人來實現。隨著慧能“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”這首深得東山法門真諦偈語的出現，弘忍既喜且驚，抓住這百年難得一遇的事機、契機，毅然將地位低下的慧能作為法嗣。慧能的出現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從某種意義上講算是緣，可嘉的是弘忍大師能於偶然之中見必然，獨具慧眼，高下在心地把慧能推上了法門前臺。

慧能雖出身貧寒、學歷低、資歷淺，但卻能領悟出一些高僧參不透的頓教精妙，這事實的本身恰好同五祖弘忍大師的理論思想相印證。慧能鬥字不識，便可不執、不迷、不拘而出乎其外。如此看來，選擇慧能作為法嗣又在情理之中。

慧能的脫穎而現，似乎帶上“天成人願”的神秘色彩，但決不能由此而忽視弘忍大師的栽培之功。弘忍考察、遴選、擇定法嗣極富有心機：比如打破依流平進的慣例，令門下各明心性，考校有慧根之人；擦掉慧能偈語，謊稱其“亦未見性”，防止了佛門的殺機頓起；袈裟傳授後，秘而不宣，使一棵“有根之苗”免遭扼于萌芽之中，所有這些，充分顯示出了弘忍的周到、縝密。

六祖慧能牢記弘忍大師“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矣！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”的叮囑，南歸隱遁一十六載後，繼開“東山法門”，不負厚望，使禪宗之風大昌於世，光被寰宇。

“五祖弘忍大師傳燈”的過程可說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集。

（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系主任·教授；湖北經濟學院社會科學系主任·教授）